

尋真無悔

陈铁健 八十文录

陈铁健 著

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在哪里？

红军何以败走苏区？

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位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怎样看待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陈铁健
著

陈铁健
八十文录

尋
真
無
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 / 陈铁健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8
ISBN 978-7-203-08620-8

I. ①寻… II. ①陈…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1612号

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

著 者：陈铁健
责任编辑：何赵云
装帧设计：陆红强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c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31.5
字 数：400千字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4年8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620-8
定 价：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改变，从阅读开始



目 录

历史功过向谁论

- 北伐漫议····· 003
- 中国大革命成败之议····· 015
- 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 ····· 018
- 宜将直笔写西征——西路军研究散论 ····· 037
- 西安事变简论——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读后 ····· 047
- 历史功罪向谁论
——《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 ····· 082
- 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
——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 ····· 093
- 红军何以败走苏区？
——回到历史现场省视苏区革命 ····· 106

得失成败之间

- 蒋介石骗了孙中山？——蒋孙关系新论 ····· 121
- 得失成败之间——写蒋介石人生的一本新书 ····· 136
- 亲情乡情与“夫人政治” ····· 150
- 跋《蒋介石与中国文化》····· 156
- 序《蒋家王朝》····· 158
- 最后的觉醒——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 ····· 162

“扩拓万古心胸”——读《陈独秀著作选编》	190
启蒙三人行	196

不多余的《多余的话》

重评《多余的话》	201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心路历程	218
《多余的话》两段佚文	225
瞿秋白被捕时间考辨	231
瞿秋白绝命诗考	236
人格的魅力——瞿秋白与张太雷	243
短暂的交谊——瞿秋白与胡适	250
历史的沧桑——瞿秋白与蒋介石	264
瞿秋白案复查散记	282
瞿秋白研究通信选	292
瞿秋白与中山大学的纠结	
——《清校问题》中俄版本比对与相关史实	299
观书心语——《瞿秋白研究文丛》读后	317
尘封半个世纪的“五四”先驱王希天	320
一生多变章士钊	339

流逝的岁月

送李新先生远行	351
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	364
黎澍先生十年祭	382
洞察历史的深刻	387
李时岳师	391

尘凡多变敢求真——胡绳先生印象	396
观史犹忆阎宝航	401
亦学亦官胡乔木	404
怀念郑惠	410
悼蔡德金	415
记彭明先生	419
马连儒周年祭	426
杨劲桦与《梦回沙河》	429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

神化杂谈	435
鬼术杂识	438
游民文化值得研究	442
门外文谈	444
“谷底”论辨析	449
出新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454
出新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研究	458
勿忘日本侵华罪行	460
国军有一个敌后抗日游击战场	462
民国反贪何以失败	464
《“中间地带”的革命》告诉你：中共何以必胜	466
豫中行记痛	469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	472
半生多误陈独秀——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读后	476
“终身反对派”陈独秀	486

后 记	491
-----------	-----

历史功过向谁论

北伐漫议

岁末年初，读杨天石等著《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一书。边读边录，采撷书内史、论精华，并略抒一己之见，成札记数则，零散不成体例，故名之曰漫议。浅陋难免，祈方家正之。

1. 北伐决策

东征结束，广东底定，蒋介石即意图北伐。《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一书援引蒋氏自云：“预定明年八月克复武汉”（1925年12月28日日记）；“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1926年1月4日国民政府春酌演说）；“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1月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以三个月为准备，六月底出兵北伐”（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的报告）等语，可谓论之有据，足以服人。

各地将领冯玉祥、方本仁、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李济深、朱培德等，纷纷赞同北伐。3月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议决进行北伐准备。4月16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5月，李宗仁自广西来穗，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批评“北伐出师迟缓”，蒋认为李“不识政治复杂情形”^[1]。

政治形势复杂，原因多种，主要是苏俄的态度。苏俄顾问团反对过早实行北伐。国民党二大时，季山嘉即反对北伐计划，为蒋所不满。1926

[1]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中华书局，1996年，第18页。

年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1]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鲍与蒋长谈4个小时，对北伐多有争执。蒋不为所动，坚持出师北伐，鲍只好妥协。^[2]

鲍氏以对革命有利与否判定是否出师北伐，自然不错。然而，他又抵制不了蒋介石即行出师北伐的决定。原因很简单，蒋介石是以继承孙中山的北伐遗愿为号召，而在中山舰事件之后，鲍罗廷由限蒋转为扶蒋；视蒋氏为“中派”，“控制”不成，便索性助其获得更大权力与实力。历史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了“有利于革命”的反面。

2.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与军事集权

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任命。6月3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商量总司令人选。张、谭二人推蒋，蒋辞而推谭，谭不允。蒋再与鲍罗廷商量，鲍力劝蒋就任，并云：如蒋不出任，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3日，蒋对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提出战时“无论前方后方，通用集中的原则来办理”，一切团体组织、言论，都必须受总政治部的指导和监督，并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37次会议议决，同意蒋的要求，决定赋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7月2日，公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

[1]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7页。

[2]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7—18页。

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7月4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会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代理），任命蒋为党中央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的全权。^[1]至此，蒋介石已身兼五要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起以他为中心的军事集权体制。

蒋介石的军事集权是蒋氏个人争得的，也是国民党中央按法定程序授予的，其中当然包括苏俄顾问团特别是鲍罗廷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其合法性、权威性，显而易见。可以说，蒋介石身处国民党内左派、右派，共产党以及苏俄顾问等各种政治力量交错复杂的环境中，对于北伐战争进程中必将出现的矛盾和纷乱，有相当敏锐的预察。从其个人能力而言，他在政治判断上的前瞻性，实际行动上的果断性，远远超过苏俄总顾问鲍罗廷，更非陈独秀所能望其项背。

3. 北伐战略

蒋介石早在1917年9月，即为孙中山起草《对北军作战计划》，拟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再捣北京，以会师南京之时，划分第一、第二两期作战，颇类日后北伐战略。

1926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事过九载，形势剧变，蒋介石对北伐战略的思考，更求周全完备。在国民党二大会上，季山嘉等苏俄顾问反对北伐武汉顺长江底定东南，而主由武汉挺进西北，与冯玉祥会合。后蒋主同时攻湘、赣，加伦则主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

[1]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9—21页。

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7月1日，蒋下达北伐动员令，宣告“继承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1]

蒋介石刚愎自用，少有从善如流时。但对北伐战略决策，尚能兼采众议，择善而定，颇有些统帅气度。蒋氏一生膜拜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虽无曾国藩之识量、左宗棠之决断、胡林翼之才略，但在北伐时期，其言行似不无曾、左、胡的影子。

4. 战场指挥：斗力与攻心并用

两湖之战，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6万余人，在工农群众支持下，大战40天，所向披靡，终于10月10日克复武汉三镇。作战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亦能征询诸将及顾问意见，纠正偏差，从善决策。但蒋之嫡系第一军腐败不为其争气，第二师刘峙部攻城不力，唐生智要蒋将刘师调离。蒋不堪其辱，严责刘峙“奋勇拼死”，“虽至全军覆没，积尸垒丘，亦非所恤！”然第二次围城，刘师又虚报抢功，使蒋“愁急不知所为”。^[2]

战场形势，波谲云诡，变化莫测，非预拟纸上方案所能判断。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指挥官随机应变，果断处置。北伐江西战场，原取守势。唐生智、李宗仁在武汉战场得势，欲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所拟二期作战计划，欲控两湖，而以蒋分兵攻赣东下。8月5日为总司令部会议否决，决先攻武汉，监视江西，适当时可占南昌。然至8月底孙传芳主力10万大军援赣，江西已成为主战场。加伦对用兵豫、赣方向未定时，蒋介石已决心入赣，亲自指挥江西作战。^[3]南昌未下，蒋已决定进兵浙江，

[1]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20页。

[2]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42—44页。

[3]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56页。

进而顺江东下，直扑宁沪。加伦反对，说是“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1〕}蒋不为所动，卒获成功。

南昌之役，蒋之嫡系王柏龄部将领腐败，作战不力，招致第六军、第一军损折严重。第二次围南昌，蒋求胜心切，令部队硬攻坚城。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遇敌大乱，全军尽退。蒋自感指挥无方，自谴云：“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2〕}，尚能承认自己的过失。第三次攻南昌前，第四军、第七军已入赣作战，实力大增。第七军三战皆捷，被誉为“钢军”。蒋介石与加伦、白崇禧等多方筹划，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在南浔路寻敌主力决战，一方面与孙传芳信使往还，所谓“斗力与攻心并用”。北伐战争中，前期有蒋介石与孙传芳之间的谈判，后期有蒋氏与张作霖之间的和谈。论者尝以为这是蒋氏与军阀之间的拉扯勾搭，实在有些冤枉。须知：“兵者，诡道也”，战略与诡谋本来并无本质差别。蒋介石这样做，正合用兵之道。“他之感到胸有成竹，固然由于孙（传芳）外强中干，企图避免苦战，一方面也因为他（蒋介石）能控制何应钦在汕头之部队，而他本人又亲自主持对驻在杭州陈仪的策反，预料沿海之大包抄已实际可能也。至于翌年初又有安庆之陈调元的归顺，所以以后之取得京沪，不过在江西将孙部主力囊括之后的军事行动之尾声。因此举（为）蒋介石经历生平第一次之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果辉煌亦为以后未有。”^{〔3〕}黄仁宇先生之如此评断，虽不无溢美，但大抵符合历史实际。

北伐战争自1926年5月先遣部队入湘作战起，到1928年6月底定平津止，凡二年，分前后两期。北洋军阀时代结束，国民党“党治”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君主们，大都出自于中国北部，即如江苏沛县的刘邦、安徽凤阳的朱元璋这两位被目为“南蛮”的人物，也是长江以北

〔1〕《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96页。

〔2〕《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62页。

〔3〕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78页。

淮河流域的人。迄于民国时代，江南出现了大批政治领袖人物。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四人均出自广东，一时蔚为大盛。这意味着南方已不仅在经济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占据优势。蒋介石乘北伐之胜上台，开了两个先例。一是以他为首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南向北的成功战争；一是作为吴越文化区的人物，他是登上统一的中国最高统治地位的第一人。

5. 党权与军权斗法

北伐战争开始后，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共中央感到蒋介石势力膨胀，原先对蒋实行妥协策略不当，遂改弦易辙，企图扶植左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先后发生的迎汪运动、联席会议、迁都之争、恢复党权和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自中山舰事件后遭压制以来所取得的不小的胜利。然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诚如陈独秀所说：“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惟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1]

中共汉口特别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扶植和援助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政权，有党权。”^[2]中共扶持左派的方针可谓道顺理合，绝对不错。问题是：第一，谁是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动摇的左派，更不是口蜜腹剑的假左派。中共中央拥戴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恰恰就是一个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左派身上，必须壮大发展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并有必要的应变准备。^[3]实际情况是，除了叶挺独立团等少数部队能够掌握，中共中央几乎是无拳无勇的空手革命派。

北伐离穗之前，蒋介石还在抗议右派对他不能谅解。一出粤境，他所

[1]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33页。

[2]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37—138页。

[3]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38页。

抱怨的对手已是左派、中共和苏俄顾问。8月30日日记云：“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8月31日日记云：“鲍（罗廷）等限制革命军发展防范本党北伐成功之心到底不懈，悲夫，中帅（指孙中山）倏忽逝世，何以吾辈后死者艰难至此耶？”他深知左派与中共之“迎汪”实为“倒蒋”，因而恼怒异常，扬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秘藏的杀机毕现。只是此时蒋介石还要依靠武汉供应军饷（宋子文将1300万元军饷暂扣不发，逼蒋同意迁都武汉），不得不在表面上敷衍武汉方面。^[1]

军事斗争靠实力，政治斗争也非有实力不可。武汉政府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武汉政府的基本策略是党权限制军权，幻想党纪、命令、舆论可以制服蒋介石。但是，在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面前，虚夸党权的左派们，是那么苍白无力。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不是党权。^[2]

6. 群众运动与土地革命

北伐时期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但当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态度却相当复杂。反对乃至敌视群众运动者，以群众运动的失序与过火而全盘否定；全盘肯定群众运动者，则忽视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略的指引，从而使失序和过火现象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农民运动几乎弄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身着长衫即可视为土豪劣绅，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财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被一律当作“革命先锋”，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短时期的恐怖现象。^[3]“矫枉过正”乃历史现象，

[1]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142、147页。

[2]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379页。

[3]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229页。